

去年大连獐子岛集团组织“著名作家再次走进獐子岛”采风活动,在下有幸忝列其中了。说也巧,《中国钓鱼》月刊第八期就刊登出了三个页码,冠以红色标题“美丽的獐子岛,精彩的大鱼杯”的长篇报道。獐子岛是全国海钓锦标赛的国际站。笔者是此刊的名誉主编,而且这一期也同时刊登了我的钓鱼游记散文“五游二钓奥克兰”,此时8月8日在下就站在獐子岛上了!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了。

獐子岛地处大连东一百多公里海域处,它不过是大连市长海县所属的一个岛镇,面积不过十五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后它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使这个小岛镇成为黄海诸岛一颗闪亮的明珠了。小岛拥有2000平方公里的“现代海洋牧场”,水质已达二级以上,水中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它独占天时地利,它的生态价值与养殖成果早已赢得了中国和世界海洋国家的认可,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它生态、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我作为中国钓协和《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副主席曾多次参加各种国内的垂钓活动。在青岛、北戴河、湛江、台湾、香港以及巴西、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等地我都抛竿垂钓大海中,但都没有今天在这个小小獐子岛海域上开辟的千亩人工渔礁钓场上钓获丰硕,这不仅源于小小獐子岛之魅力,更源于今日执竿钓者大都是来自大陆有名的执笔杆子的文人墨客。

獐子岛上不过一万五千居民,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银行、邮局、托儿所、养老院、博物馆、海滨浴场林林总总样样都不少。这里小巧的广场也和大城市的小区一样,每晚唱主角的“广场舞”依然不可缺少。居民到了自由自在的晚上也随着自携的录音机,伴着舞曲,眼

我也晚,未曾经历70多年前那场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但从父母那里感受它的英勇悲壮,却是从儿时开始的。

现在仍记忆犹新的是,当我们兄妹几个从记事起,就经常会听到父母在工作之余,唱起那些流行的抗战歌曲。通常的情况是父亲高声唱,有时还会激动地挥动手臂打拍子,而母亲往往在一旁轻轻地和。歌曲内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激昂悲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逼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沉痛愤怒;还有“青纱帐里,游击健儿呈英豪”的明快、“我们今天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自豪。遇到休息日,父母又常常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几本珍藏的影集,翻看里面那些保存完好、却已泛黄的照片。照片定格着他们学生时代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种种情景,他们边看边回忆,有时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有时又开怀大笑,如遇故人。因此,每当听父母唱抗战歌曲或翻看老照片时,幼年的我便朦胧地感到,那一切对于父母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渐渐知道,父母的青春时代是在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难岁月中度过的,那是他们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未对子女完整地述说过这段经历。最初只知道父母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年轻时大多是在昆明、重庆等地度过的。直到父母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才读到了他们生前所写的简历,具体了解了他们留在那个年代的人生印迹。

父亲曹学源最初投身抗日,是在1935年2月上海麦伦中学读高

垂钓在獐子岛

【作者简介】

万伯翱 1962年秋,中学毕业后的他为其父万里同志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就读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作品有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我看红墙内外》(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等。

着自选的教练一遍又一遍翩翩起舞呢!还有一个很多大中城市都没有的景致,就是小岛居民对泥土的无比珍惜,岛上每块泥土都显得弥足珍贵,家家户户都利用起了房前房后,甚至于街旁、桥底、沟边辛勤耕作着每一寸宝贵的土地,使地上豆角长垂、瓜果横卧。那点点簇簇盛开的紫色和绿色豆角花朵和小喇叭似南瓜、黄瓜的橙黄色花到处都在迎风招展,招来辛勤蜜蜂和花蝴蝶不时拜访,显示出“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金秋生命活力。红薯、黄豆、玉米长势旺盛,叶叶如墨似洗,表明这里阳光营养和水分都很充足,秋粟秋庄稼的长势比大陆还好!这是辛劳的獐子岛居民除了独特的渔业大生产化外,副业生产也绝不比大陆农家逊色呢!

1972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节,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英雄渔民王天勇冒着雪花的飞舞,在零下20度的酷寒下,下潜海底采摘野珍。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防寒保暖潜水服装,在深海四五十米下,他感到海水巨大压力和刺骨的冰



獐子岛

寒,他是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指令后,不断潜游百多次终于擒获优质鲍鱼半吨之多!接力棒似快马加鞭转送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使周总理和尼克松一行在国宴上都大赞这獐子岛鲍鱼“Very good! OK!”“天下第一鲍、第一采鲍英雄”称号的美誉盛传至今。虽然海水冰冷,但革命群众的热情更高。当时还在“文革”中农垦战线当知青的我,自然是从没见过,当然更不知“国鲍”是啥样啥滋味。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广州的宴会上同学习远平(习仲勋的儿子、我洛阳外院同学)第一次请我到了广东省会才品吃过山珍海味(鲍鱼)的不凡滋味!

一位獐子岛上姓杨的七十五岁的老渔民告诉我,抗战时我们国弱民不强,日寇侵略军来了,没几个人就仗着他们的洋枪、东洋刀在獐子岛横行霸道,猎狗似的鼻子嗅出了这“中国北纬39度”海洋中生产出的绝好海鲜产品,忙掠夺一船又一船海鲜押送回日本了。真是国弱无外交,国弱也无海洋了,国弱什么都是人家的了!

我们作家代表团分乘两艘快艇出发了。这两艘都是国产制造,山东威海船厂制造。快船一路乘风破浪,蓝天白云下,一直往东南急驶,大约

◆ 万伯翱

四五十分钟后,到了在2000平方公里“海上牧场”中的千亩钓场,海里已投放下万吨级人工鱼礁。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动物是喜成群出动和群居,海洋世界中的鱼群更是如此。而鱼类像陆上动物一样也是爱钻进“窝中”,这里人工鱼礁窝似“大窗户的碉堡”,使鱼群感受到了保护,能在窗中自由穿梭安全生育女。獐子岛周董董事长胸有成竹地说:“保证作家们都能钓上鱼!”我们的船抛锚停定了。今天船钓,主人未准备任何长短手竿和海竿,清一色“土制手把线”,垂钓几十年的我也第一次使用这獐子岛渔家自制的“原始武器”,起初也是半信半疑,这手把线下四十多米,下钓线是牢系着四股结实的铁条,中间的铅坠如同一个秤砣般大小,四个钓钩均是22号森然迎敌黑大钩,钓线也是2毫米的粗线。手把线在船舷两侧徐徐入水,下到海底。就是我国大陆上大江大湖也都少见如此深度,怪不得莫言赠我钓鱼诗中说:“青鲤白鲢小打闹”,诺贝尔奖得主敬佩大海中垂钓:“金枪马林大酋顽,大钓海上惊巨澜”,莫言钓过鱼,更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颇知海上钓大鱼的壮观!实际上不管是古巴老头钓上了巨大的马林旗鱼,还是今天我们钓上来的黄鱼,

我都信奉:“鱼是我们的敌人,更是我们的朋友。”——文学家钓鱼高手海明威这句名言。刚开始我们这些陆客还是找不着感觉。无论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董保存,还是《激情燃烧岁月》大作家石钟山,作家们都在狐疑:“这目不可测的大海中此处到底有鱼否?不会忽悠我们吧?”此时船尾却传来呼叫:“周董董事长上鱼了!”目光全扫向船尾:嗨,人家硬是一下拉上了两尾惊慌失措的黄鱼呀!我们忙过去取经,周在岛土生土长四十个春秋有着丰富海上钓鱼经验。什么上下潮,什么季节风,什么流水中鱼来鱼往他都门儿清,獐子岛发明这手把线如何看钓线移动,当然你手把线手感最为重要了,我们心领神会。好在这些作家个个也是心灵手巧,再上鲜虾饵对鱼礁窝中饥饿鱼儿诱惑,纷纷又把这手把线徐徐入海进礁窝如此照办,不过一袋烟工夫,我手感沉重,我的判断:“有了!”忙迅速提拉双手不断倒线,果然鱼儿出水,夕阳金光下鳞片闪烁猛窜乱跳两尾归顺在了下,摘钩入仓!

还有省文联副主席、大连市作协主席素素和她的助手肖正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个个照此手把线抛钩入海,不断诱使鱼儿吞挂在手把线钩上的鱼虾,大小黄鱼纷纷出水了。总共下来两小时多,两船作家竟钓获了70斤的大小鱼儿!

太阳接近海面了,广阔无垠的黄海万点金光,水光一色,在风动浪涌中海面如同无数条金蛇在狂舞摆动。作家和主人们满载着渔获而收竿收网归家了。在大食堂等待我们宴会的作家团团长毕淑敏和副团长关仁贵先是大吃一惊:咱们作家能钓到这么多鱼和捞到这么多海鲜?!两位主席又互视莞尔:“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足够我们宴会上食用了!”

父母的抗战情结

【作者简介】

曹明纲 浙江上虞人,1949年11月22日出生。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应聘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审。

中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也参加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中毕业后,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期间,除了出席进步学生举办的时事座谈会外,每周课余时间都由大学同学创办的惠寒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由苏州迁往湖州的东吴大学因守军北撤而停办。父亲只身一人流浪到了武汉。在那里他遇见了东吴大学的同学蒋学模、顾葆衡等人,于是一起加入了湘鄂赣边区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不久就改编为新四军,父亲在第一支队一分队政治部宣传队,于湖南平江、浏阳等地开展宣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春,部队开赴东战场御敌。在一次爬山过岭的行军中,父亲的大脚趾破裂中毒,不得不与几个身患重病的老红军战士一起,退回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处。按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的指示,前往衡阳进行治疗。在此期间,他一面养病,一面在全国青年协会主办的军人服务部衡阳支部负责宣传学习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团结了衡阳各界大部分青年,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于是被召回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处。

这年5月1日,经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前往大城市开展工作。随着九江吃紧,父亲从武汉乘船到达重庆,参加了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高校南迁时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学于师范学院教育系。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父亲担任了学生党小组长,同时又是民众学校的校长。在谷斯涌写的《两代悲歌——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璉》一书中,就提到过父亲曾与陈璉为了筹备办学经费,一起前去拜访罗叔章的情景。1939年夏天,父亲在一次由联大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群众团体“群社”开会时,认识了当时担任社会服务股股长的母亲朱瑞青。

母亲是1938年在上海中西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被录取第一志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母亲入学不久,即加入了进步组织“群社”,从事办民众夜校、街头壁报、歌咏演剧等一系列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一年后又被推举为“群社”的第五任社长。1940年10月1日,在西南联大地下党总书记袁永熙的授意下,经吴锡铨和父亲的介绍,母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父母也由相知到相爱,由同志成了恋人。1941年2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由此也派专员康泽赶赴昆明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力量,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让一批身份已公开的学生党员撤离西南联大。父母即在之中。为了掩护起见,他们根据

◆ 曹明纲



▲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大

组织指示,以夫妻的名义外出工作。由于父亲的名字已被列入抓捕的名单,他就和母亲一起被安排去云南永仁县大田镇县立中学教书。父亲改名曹维坚,母亲改名朱迺英。一个教语文、历史,一个教英语。

一段时间后,根据袁永熙对时事的分析,父母又毅然前往当时很需要人的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大约1942年10月,由地下交通员沈乃恭带领,他们顺利到达了淮北政后根据地,进入新四军主办的江淮大学学习,父亲担任了所属小组的组长。到次年年初,日寇开始对淮南、淮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江淮大学不得不暂时停办,父母也因此回到了上海。在接到已在重庆的联系上级古锡麟的来信后,两人又决定立即赶往重庆。到了重庆,父亲一面工作,一面就读于重庆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夜校部);母亲则考取了重庆北碚暨旦大学。1945年10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月,父母在重庆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成了可谓与抗战相伴始终的伉俪。

在具体了解了父母抗战八年这段充满颠簸、曲折的人生经历之后,

我不禁感慨系之。父母热血燃烧的青春,曾在行军路上,在联大校园,在昆明城乡,在永仁中学,在淮北根据地,在四川重庆,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迹。尽管没有像为抗战捐躯的烈士们那样感天动地,也没有像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那样可歌可泣,但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没有回避,没有躲闪,也没有旁观和犹豫,而是挺身而出,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波忙碌,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如今父母虽然已长眠于苏州的青山绿水之间,但是他们勇于担当民族大义、国家兴亡的人生准则,却正是中华民族历尽患难而不屈不挠精神的继承和延续,值得子孙后代永世铭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首往事,不能不使人更加怀念那些曾为民族生存而献出青春的人们,重温他们当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为了救国的坎坷经历。也由此,使我对于父母生前为什么一直怀有浓厚的抗战情结,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想,从整个发展的历史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的底谷走向日益兴盛的转折关口,因此凡是曾投身其中并为此付出的前辈,都应该受到子孙后代的尊重。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奋斗,非但今天的扬眉吐气无从谈起,未来的放飞梦想更不能想象。

